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

——驳斥新自由主义对教师、学生和公立教育的攻击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Values

Challenging the Assault on Teachers, Students, & Public Education

[美] 亨利·A·吉鲁 (Henry A. Giroux) 著

吴万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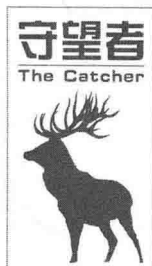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荣获杰出学术著作称号，获美国教学和课程协会 (AATC)

年度戴维斯 (O. L. Davis, Jr.) 图书奖

■ 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ESA)

2012年度批评家评选书目奖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

——驳斥新自由主义对教师、学生和公立教育的攻击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Values

Challenging the Assault on Teachers, Students, & Public Education

[美] 亨利·A·吉鲁 (Henry A. Giroux) 著

吴万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 驳斥新自由主义对教师、学生和公立教育的攻击/
(美) 吉鲁著; 吴万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6

书名原文: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Values: Challenging the Assault on
Teachers, Students, & Public Education

ISBN 978-7-300-22759-7

I. ①教… II. ①吉…②吴… III. ①教育模式-研究-美国 IV. ①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3129 号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

驳斥新自由主义对教师、学生和公立教育的攻击

[美] 亨利·A·吉鲁 (Henry A. Giroux) 著

吴万伟 译

Jiaoyu yu Gonggong Jiazhi de Wei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3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作者

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1943—），著名社会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的创始理论家之一，先后在波士顿大学、迈阿密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2005年起担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全球电视网讲座教授和“挖掘真相”董事会成员。吉鲁著述甚丰，有著作50多部，发表学术文章300多篇。最新著作包括《社会的黄昏：可处置性时代复苏的公共性》和《青年的反叛》。2002年，吉鲁曾被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评为当代50位教育思想家之一。

关于本书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考察了美国社会的公共价值观转变以及美国背离民主走向市场的教育模式。书中讨论了公共教育作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理想遭受的围攻，鼓励教育家成为投身于建构成性学习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培养人们捍卫作为普遍公共利益的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能力，因为这些对民主社会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关于译者

吴万伟，河南洛阳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译著有《行为糟糕的哲学家》（新世界出版社，2006）、《中国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2010）、《分配正义简史》（译林出版社，2010）、《大西洋的跨越》（译林出版社，2011）、《城市的精神》（繁体版：财信出版有限公司，2012；简体版：重庆出版社，2012）、《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等。

我的一生中一直有幸得到异常勇敢和聪明的女性的保佑。
本书就献给这些福星，她们是：

苏珊·希尔斯·吉鲁

卡罗尔·贝克

格蕾丝·帕洛克

玛雅·萨巴多斯

安托瓦内特·索莫

维多利亚·哈伯

莱斯利·撒切尔

玛雅·施纳沃尔

序言和致谢

虽然我们非常尊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但对美国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而言，现在恐怕是最糟糕的时期。公立学校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产业，“顾客满意度”和效率被置于凌驾一切的首要地位，而这些主要是依据实证性的问责措施等狭隘的标准来评判的。当公立学校不是作为产业或潜在的、利润丰厚的投资来运作时，它们简直就变成了控制中心，维持着意在惩罚那些因为种族和阶级而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的惯例。贫穷白人、棕色人种和黑人的孩子不仅进入成绩差的班级，而且在走出学校大门后直接进入通常所说的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如今学校已经变成特权阶层的训练中心和穷人的遗弃区。公立学校老师现在被视为新的“福利女王”；大学教师不被看作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和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而被视为职业承包商的新阶级。与此同时，右翼政客控制下的很多州采取的严厉政策打着财政紧缩的幌子大肆削减教育经费，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因而都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困境，大学已经被改造成文凭工厂，按照大公司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和管理模式进行重组。无论是公立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开设的课程不仅促成而且鼓励了学生的无知，因为课程内容的价值几乎完全依据这样一种哲学确定的，即任何不能被量化的东西都被视为毫无用处。在企业教学法看来，批判性思考、独立自主、发挥想象力或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意识等统统没用。积极反思和行动的老师、提出令人不舒服的问题的老师、挑战官方权力话语的老师、推动真理探索并支持自由实践的教学法的老师即便不被视为反美分子，现在也一律被看作动机可疑的家伙。

与此同时，在右翼政客、保守派和企业利益当道所造成的绝望和愚蠢

之中，我们完全不清楚是否还有一丝希望。就在笔者写这篇序言之时，全世界的工人和年轻人正在游行和示威，他们反对市场经济的命令、价值观和政策，因为这些已经腐化了政治，破坏了公共价值观，并把民主推向消失的临界点。工会、公立学校教师、高等教育和维持公共价值观活力所需要的所有公共空间都遭到挑战，其遭受攻击的方式令仍然相信实质民主理想和承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在美国，攻击工会的政客如威斯康星州州长司各特·沃克（Scott Walker）和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希望抽去社会服务的核心内容，然后将其卖给出价更高的竞标者。他们并不孤单，而是一种政治运动的表征。这场政治偏激运动企图摧毁批判性的文化、尽职尽责的官员，以及赋予美国的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活力、实质内容和希望的机构。

因为美国已经变成市场社会，民主的意义已经遭到背叛，在私有化、拆除管制和摧毁公共生活的所有残余方面，企业力量和金钱似乎所向披靡。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现在有了相应的匹配品——国内战争。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已经找到了与之对应的国内战争，只不过打击的对象是国内穷人、移民、年轻人、工会、公共领域工作者、社会福利和学校老师。保守派和茶叶党极端主义者呼吁的共同牺牲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模式，即毁掉福利社会，保留和扩大超级富豪和大公司的权力，用大幅减税为顶端的1%人口聚敛财富，同时把全球经济衰退的负担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肩上。原本要对付华尔街金融大鳄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的那些赤字削减和财政紧缩政策，现在却剥夺了教师的集体协商权利，取消了长期以来与社会福利有关的项目，并把年轻人交给思想已死的学校和债务缠身的未来。美国大部分民众现在已经体验到了绝望、被抛弃的感觉和不必要的人类痛苦，生活的困苦常常不只令他们境遇凄惨，甚至到了威胁生存的地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伦理学取代了团结互助、社会责任和关爱他人的可靠观念。意识形态似乎不再重要了，因为右翼共和党人对辩论和说服已经越来越缺乏兴趣，他们更愿意使用严厉的立法欺负所谓的敌人，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赤裸裸的威胁。威斯康星州州长司各特·沃克曾提出要动用国民警卫队以防止教师工会抗议可能失去的集体协商权和一系列反工人的提案。

国家层面上缺乏可靠的领袖，年轻人和工人都在观察世界各地尤其是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欧国家——如法国、英国和德国——发生的争取民主运动。国外的斗争让美国人意识到若集体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失掉了合法性后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激烈的街头抗争、非暴力聚会、作为替代性政治和教育工具的新媒体的广泛使用。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争取集体行动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种抗议也发生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虽然参与人数不是很多。许多美国人再次求助于民主，但拒绝了投票这种空洞的形式，也抛弃了它不真诚的应用，正是这种投票为生产庞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政治体制确立了合法性并为之辩护。民主的承诺仅仅体现在口头上，严酷的现实暴露了它的虚伪。民主的力量具有传染性，人们只能希望那些相信教育是批判能力、政治和民主本身的基础的人会同投身反对过去 30 年来美国转向政治和经济威权主义体制的任务。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新的眼光和新的政治以激发新的民主前景。这种前景能想象出一种生活和社会，里面没有无休止的军事战争，没有物质浪费，没有极端的不平等，没有被抛弃的人口和不必要的人类痛苦。《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的核心是一种信念，即除非正规学校内外的教育被视为任何可靠的观点的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有变化。要出现真正的改革，就必须使可靠的、批判性的、构成性的文化到位，这种文化支持积极投身公共生活、公民勇气、公共价值观、异议、民主管理模式的理念，同时还要真正相信自由、平等和正义。人和机构很重要，但思想观念更重要，学校内外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为不同年龄的美国人提供条件，使其有能力进行批判性思考。只有批判性地思考才能有充满想象力的行动，才能接受美好生活就是公平正义的生活的概念，在这样的生活中，民主的价值、实践和眼光延及每个社会成员。希望本书能为该工程贡献绵薄之力。 xii

笔者想感谢夫人苏珊·希尔斯·吉鲁（Susan Searls Giroux）帮我思考了这些章节中的很多观点，也感谢玛雅·萨巴多斯（Maya Sabados）、詹妮弗·费舍尔（Jennifer Fisher）、格蕾丝·帕洛克（Grace Pollock）阅读、编辑本书并使其整体水平得以提升。笔者非常感谢挖掘真相

(Truthout) 的诸位同仁维多利亚·哈伯 (Victoria Harper)、莱斯利·撒切尔 (Leslie Thatcher)、玛雅·施纳沃尔 (Maya Schenwar) 允许我把观点传播到公共空间, 检验我面向更广泛知情读者说话的能力。笔者还要感谢好朋友肯·萨尔特曼 (Ken Saltman)、唐纳德·马塞多 (Donaldo Macedo)、克里斯托弗·鲁宾斯 (Christopher Robbins)、大卫·克拉克 (David Clark)、图鲁·奥罗兰大 (Tolu Olorunda) 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随着笔者进入人生的暮年, 很多好朋友的帮助将让最近的人生转折变得不那么困难。笔者要特别感谢劳伦斯·哈特 (Lawrence Hart)、萨布哈希·迪格赫 (Subhash Dighe)、卡洛琳·莱维斯 (Carolyn Levis)、布鲁斯·科尔曼 (Bruce Korman)、司各特·胡恩 (Scott Huehn)。笔者也非常感谢系主任苏珊尼·克罗斯塔 (Suzanne Crosta) 的慷慨经济资助, 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本书某些章节的不同版本曾经发表在《高等教育记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教育的政策未来》(*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和《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上。

目 录

第一章	为危机时期的公立学校教师辩护·····	1
第二章	慷慨害人：比尔·盖茨、公立学校教师及羞辱政治·····	13
第三章	没有工作的教师 and 没有希望的教育：超越救助和测量崇拜 陷阱·····	30
第四章	特许学校的灾难：为什么邓肯的企业学校无法提供真正 重要的教育·····	49
第五章	低能化的教师：以改革的名义攻击教育学院·····	73
第六章	企业文化和公立教育的死亡：布隆伯格市长、大卫· 斯坦纳和企业“领导力”政治·····	88
第七章	公共知识分子、清晰政治和语言危机·····	99
第八章	保罗·弗莱雷和见证教育学·····	116
索 引·····		124
专有名称译名对照表·····		133
译后记·····		141

第一章 为危机时期的公立学校教师辩护

从前把公立学校教育视为重要的公共服务的高尚传统在美国已经迅速衰落了。这个由重要学者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的民主遗产尊重教师的价值，因为他们为服务更大的社会利益奠定了关键的教育基础。教育者被视为宝贵的资源，教导学生如何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形成对正义矢志不渝的忠诚，提高辨别强有力论证和包含严重偏见观点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注重培养年轻人成为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拥有成人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观、技能和知识。这样的公民应该有能力质疑“常识”、官方说法、公共舆论和主流媒体。创造条件以培养学生具有批判能力是教学过程的核心内容，也是让学生能够影响和扩展民主机制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但是，1980年以来，教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些势力把学校当作私人权利而非公共利益。在当今的教育气候下，教师很少被赋予理所当然的公共知识分子地位，其实他们仍然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道德指南，用以测量社会对青年和未来的投入有多么严肃和认真。但教师现在被去技能化，被非正式地从学校管理过程中剔除出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贬低为工匠或从属于安保权威的附属品。教师们也成为右翼政客的替罪羊，他们被视为新“福利皇后”，教师工会被看作对企业权力和亿万富翁支持的市场驱动的教育运动的价值观的威胁，这些运动试图把学校教育变成获取利润的投资而不是公共利益。在这种转型背后是若干急于将学校私有化并用职业培训取代教育的势力，通过以犯罪为核心管理贫穷白人和少数族裔学生上学的学校，将教学简化为简单模式的测试和考核。¹²

公立学校的角色和教师本质的这种有害的转型随处可见。推动高利害

(high-stakes) 考试并以考试成绩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法律的通过已经限制了教师的自主性，并破坏了批判性教学的可能性和学生富有想象力的学习目标。^[1] 教师不再被要求批判性地思考并在课堂上进行创造性的革新；相反，从最好处说，他们现在被迫简单地实施既定的教学程序和标准化内容，从最坏处说，这遏制了教师的想象力，而使用宝贵的课堂时间教导学生掌握考试技巧。受制于可以被贴上“空洞的”或“被剥光”的标签的教学法，教师已经远离了探索和反思过程，被贬低为实施因循守旧的限时任务教学法的机器，这种教学法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危害。在为这种教学实践辩护的言论烟幕背后，存在着概念和实行之间的分离，这最初不过是官僚和主要是保守派的基金会的专家炮制出来的玩意儿。至于教师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如何让知识变得有意义以便使之具有批判性和有改变力量，如何与父母和更大的共同体一起工作，如何在课堂和社区发挥权威作用成为建设性的教学力量等问题，现在统统被牺牲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听命于工具理性的支配，这在很大程度上从可测量的效用的视角被定义。

这种话语很少谈论为公立学校分配更多联邦资金，更新年久失修的学校基础设施或提高工资以便扩大合格教师的总量。人们不再称赞教师为公众服务作出的贡献。除了相信教师教育我们的孩子之外，我们忽略或贬低了教师提供的防火墙的价值，正是这种防火墙将沉溺于暴力和偶像崇拜的文化与激进的、充满想象力的可能性隔开，受到良好教育的、具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改造我们周围存在的经济、政治或种族上的不公不义和在公立学校表现明显的不公平。³ 教师被迫采取一种糟糕的教育理想和哲学，从而被剥夺了价值与尊严，因为这种教育几乎不尊重知识或批判性课堂教育实践赋予学生力量的可能性。不客气地说，任何知识和技能，只要无法被测量，或被认定为与工作无关，就会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任何老师，只要拒绝实施通过“客观”评价标准考核年轻人的标准化课程，就会被判定为不称职。任何教育者，只要相信学生应该不仅仅学习遵守规则、接受考试、掌握工作技能或者轻易地接受主宰当今社会的残酷无情的市场价值观，“就将遭遇最狂热、最残酷和最坚决的抵抗”——这是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给老师的话》中的用语。^[2] 虽然教育的神秘特征一直与现实不一致（如鲍德温在谈及贫穷的黑人孩子所接受的破坏性教

育时所说), 当今公立学校遭受的攻击的确显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3]。

随着教育退化为没有头脑地痴迷于度量衡和考试模式, 公立学校越来越多地强制推行这种令人窒息的管理措施, 这些纪律令人想起监狱文化; 而且, 因为惩罚性的词汇和惩戒体制替代了教育, 学生的很多行为被视为犯罪, 造成很多严厉法规的实施, 从而将许多孩子推向了青少年管教中心或成人拘留所和监狱。^[4]随着惩戒管理体制的兴起, 战争成为学校的一种有力的管理模式, 其后果之一是教师越来越避免以对待重要社会投资和未来民主象征的方式和孩子们打交道。随着学校的军事化, 学生的不良行为变成需要警察或安全力量处理的议题。由于被剥夺了课堂生活的规范性和教学法框架, 教师不再有其他选择, 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敢实验, 不敢写诗, 不敢激发学生的创造乐趣。他们已经没有了教学的自由和力量, 用杜波依斯 (Du Bois) 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说就是: 不敢“去学习与星星交流”^[5]。

相反, 学校已经变成了一种旨在扼杀师生想象力的死亡时间。长期以来, 教师一直在向学生提建议, 纠正其行为, 帮助他们处理个人问题, 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处境, 哪怕是遇到学生最严重的违纪行为也是如此; 但是教师作为监护人和积极投身公共事物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推行被剥光的课程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蔑视教师的创造性工作, 同时将教师贬低为打工仔。无知、恐惧和学习如何参加不断涌现的考试是如今赋予学校一种使命感和共同感的东西。毋庸置疑, 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而言, 其结果肯定是死气沉沉。伟大的想法、知识模式、纪律传统以及可敬的公民理想已经不再有人关心和辩论, 也不再被当作用以扩展学生作为具有批判能力的个人和社会成员的潜力的文明力量。知识现在已经被工具化, 知识本来可能带来的敬畏、神秘和远见卓识因为被愚蠢的量化和测试逻辑重新定义而变得平庸不堪。正是这种逻辑支配了当今学校的量化考核文化, 推动了支配整个社会的效率、生产率和消费主义的更大矩阵。因为测试本身变成了目的, 它不仅抑制了批判性思考的可能性, 而且剥夺了教师进行批判性思考、采取充满想象力的教学法的可能性。这种从市场企业文化学来的赤裸裸的教学模式把教师当成快餐店拿最低工

资的打工仔，蔑视那种将公立学校当作少数幸存的能让学生学习如何处理复杂观点之地的观念。随着公立学校变得越来越亲近企业，教师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学生变得越来越愚昧无知。事实上，在某些公立学校，学生去上课的时候会发现老师根本就不在教室里，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在提供在线教育课程。多达 100 多万的学生发现其教室里唯一的成年人是电脑技师。在迈阿密市戴德县公立学校，7 000 多名学生的教室里没有老师。回答问题的是实验室工作人员，但他们不过是技术员。佛罗里达州的许多学生报名上学，结果却吃惊地发现他们来到了虚拟教室。迈阿密珊瑚礁中学的英语老师克里斯·库齐纳（Chris Kurchner）称这种方式是为“犯罪分子”上课，他坚持认为：“他们以最糟糕的方式实行标准化，这是虚拟教室中常见的情况。”^[6]该教学方法的唯一价值似乎是为学区节省了花在教师和大楼上的费用。^[7]不幸的是，这种教学方式与其说是教学倒不如说是对教师、学生和批判性教育模式的根深蒂固的蔑视。该教学方式还得到了亿万富翁改革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支持，他通过向这些学校出售在线课程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我们可以在参议院第 6 号法案中找到一个针对教师、有意义的知识和批判教育学的空前攻击的现实例证，该法案是佛罗里达州立法者推行的。

- 5 在该法案中，教学质量和对教师价值的评判完全由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来决定。教师的工资将取决于这些成绩的高低，而教师的教学经验被认为无关紧要。而且，更高的学位和专业资格证书在决定教师薪水上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小。在经验主义的残酷现实面前，专业经验和质量证书显得微不足道，这种经验主义似乎与大部分教师面对的日常挑战并无多大关系。但是该法案关系重大，绝不仅仅是对教师角色的倒退的理解和试图消除优秀教学所需的条件、地点和空间的欲望。第 6 号法案的真正要点是削弱教师的自主性和权威，强迫佛罗里达教师工会接受绩效工资。该法案也规定本地学校董事会的权力受到限制，新教师要被给予最高五年的试用期合同，然后还要遭受每年签订一次劳动合同的羞辱。而且，工资不能作为集体协商的议题，因而贬低了教育和教学的目的。该法案不仅严厉且残酷，而且从教育角度看也非常反动。它旨在把公立学校变成受企业思想支配的议员的政治工具，同时剥夺学生接受任何可靠教学观念的机会。第 6

号法案对学校、教师、学生和民主都不利，因为它缺乏对学校工作运行方式的任何可靠的伦理和政治认识，不清楚教育在民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知道哪些力量在破坏批判性的教育和学习。然而，这种贬低教学和幼稚化课程设置的论述并没有阐明第6号法案最具破坏性的消极影响：该法案强化了有利于现有阶级、种族和文化等级差异的分层思想。在批评他所说的“基于结果的高利害的考试独裁”中，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指出了促成这种考试的各种势力及其在政治上发挥威力的方式。他写道：

今天，测试设计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估计每年产值在7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背后是亦步亦趋的课程产业，就像一群追着救护车跑的人，席卷了美国各地——分发旨在帮助本地区更有效地“应试教学”的辅导教材、活页练习题和各色小伎俩。课程被深陷资金不足困境的学区大幅压缩以满足外部标准的要求。美国中小学的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标准化考试的支配。这些考试不再是帮助教师识别个别学生学习状况的诊断性助手而成了目的本身，并为此扮演起惩罚性角色，考试成绩被用来帮助加快美国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分层。^[8]

我们需要新的语言来理解公共教育作为民主机构的构成性力量，以及 6
教师在此工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1988年撰写《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时，笔者认为教育应该被视为道德和政治实践，它总是以某些特定认识为先决条件，如究竟什么构成合法的知识、价值、公民素质、理解方式和未来观等。换句话说，教育总是具有方向性的，总要试图将学生塑造成某种特定的行动者并为其提供对现在和未来的特别理解。虽然学校有简单再生产现有社会意识形态轮廓的悠久历史，但它能做得更多，因而存在着种种危险和可能性。在最糟糕的时候，教师仅被视为看门人；而在最好的情况下，教师是我们在教育子孙后代民主授权的话语、价值观和关系时所能有的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教师不是冷漠的技术工匠，而应该被视为积极投身公益的知识分子。应该支持教师创造课堂条件的努力，以提供知识、技能和敢于质疑的文化，这是学生参与批判性历史对话、质疑权威并与现有权力关系作斗争的必要条件，培养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地方性、全国

性和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公民。

就像笔者当年撰写《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时那样，把教师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把学校定义为民主公共空间的必要性在今天仍然存在。促成一种开放性的、敏锐的、具有批判探索精神而不仅仅是灌输性教学法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教师不仅是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教学实践的条件。教学科研工作只有在调动个人和社会的能动性，尊重教师在备课、科研、相互合作、参与宝贵的社区活动上所需的时间和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繁荣。换句话说，教师是主要资源，因为这意味着创造条件将教育与批判性学习联系起来，拥抱民主可能性的前景，并尊重学生生活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而不是拘泥于狭隘的职业培训和工具性教育观以及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处理方式。因此，教师理应得到尊重，应该拥有自主性、权力，以及教学工作所需的尊严。

这里的基本前提是，如果公立教育是创造合格公民的重要领域，他们不仅有能力运用其自由而且学会质疑统治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假设所需7 要的技能，那么公立学校的教师就必须被允许创造条件使其有能力担负起公民学者的责任。他们能够采取批判性立场，把自身工作与更大的社会议题联系起来，提供多样的读写方式，促成有关重大社会问题的辩论和对话，所有这些都使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条件激发其对公民生活重要性的希望和信念。学生应该从课堂中看到教师对这样一条原则的实践：他们能在塑造社会方面有所作为，以便扩大所有群体享受民主的可能性。当然，这不仅仅是改变教师或更广大公众的意识或师范教育方式的问题。这些的确是重要因素，但是在承认公立学校教师的价值时必须接受的观点是，在年轻人身上投资是政治学、伦理学和权力议题，所有这些都应该被视为将学校危机、教学危机与民主本身的危机联系起来的更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全美国的教师现在都因为一系列反民主趋势而分列两侧。一边与残酷无情的市场极端主义虚无形式有关，这种极端主义错误地把学生当成产品，把学习等同于循规蹈矩和约束性的盲从；另一边是反智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极端主义者残余势力，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对正统思想的威胁。通过求助于“传统”，他们希望压制教学法的批判性，同时清除那些更看重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更看重教育而不是培训，更看重授权而不是去